

大师经典文库



World Classics

Utopia

乌托邦

More
莫尔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京)新登字 155 号

京权图字 01-97-110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乌托邦: 英文/(英)莫尔 (More, T.) 著. -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7.9

(大师经典文库)

ISBN 7-5600-1362-7

I. 乌… II. 莫… III. 英语-语言读物 IV. H319.4:D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24284 号

大师经典文库

乌托邦

托马斯·莫尔 著

Ralph Robinson 译

* * *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三环北路 19 号)

北京国防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5 印张

1998 年 4 月第 1 版 199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0 册

* * *

ISBN 7-5600-1362-7

H·769

定价: 5.90 元



The paper in this book is produced from pure wood pulp, without the use of chlorine or any other substance harmful to the environment. The energy used in its production consists almost entirely of hydroelectricity and heat generated from waste material, thereby conserving fossil fuels and contributing little to the greenhouse effect

This edition published 1997 by Wordsworth Editions Limited
Cumberland House, Crib Street, Ware, Hertfordshire SG12 9ET

ISBN 1 85326 474 1

© Wordsworth Editions Limited 1997

Wordsworth® is a registered trade mark of
Wordsworth Edition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publication may not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mechanical,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otherwise, without the prior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s.

Typeset in Great Britain by Antony Gray
Printed and bound in Denmark by Nørhaven

出版说明

我社自 90 年代以来，一直以促进国际文化交流为己任，致力于原版外语著作的引进和出版工作，逐步形成了规模化、系列化、精品化的出版传统，在广大读者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目前我国外语图书出版呈现出较为严重的不均衡局面，即文艺类图书品种相对齐全，而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类外语图书的出版却寥寥可数，远远滞后于日益增长的文化市场需求。为了填补这一空白，我社编辑出版了这套英文版哲学、社会科学类丛书“大师经典文库”，系统地推出一批世界著名思想家、哲学家、历史学家、心理学家的经典学术名著，包括我国古代哲学籍典的权威英译本，为广大英语学习者提供高质量的阅读文本，也为各类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提供必备的学术资料。本丛书每一种均由著名专家、学者撰写评介性的序言。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7 年 11 月

041/03

序 言

程孟辉

托马斯·莫尔 (Thomas More, 1478 — 1535) 是英国早期空想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杰出的人道主义者。1478年2月7日生于伦敦一个较为富裕的家庭, 用莫尔自己的话来说, 它“名声虽然不大, 却是一个正直的家庭”。其父约翰·莫尔曾任英国皇家高等刑事法庭法官, 甚至还受到了国王爱德华四世的器重, 曾获得过贵族爵位。莫尔早年受到过良好的教育, 他还在孩提时代, 就被送入伦敦的圣安东尼学校。在那里, 他就几乎熟练地掌握了拉丁文。13岁(1491)那一年, 由于其父的关系, 他寄住在坎特伯雷红衣大主教莫顿的家中。莫顿这位具有政治家和大法官等多重身份的博学长者给少年莫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愉快的回忆。1492年, 14岁的莫尔进入牛津大学, 继续攻读和深造拉丁文和形式逻辑。在此期间, 他大量广泛地研读了古代希腊罗马学者的哲学著作, 并深受希腊大哲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影响, 尤其是柏拉图的《理想国》对其后来思想的发展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此后, 即于1496年, 他又转而攻读法律, 1497年结识了荷兰人文主义者D·伊拉斯谟, 并在以后的岁月中与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1501年成为正式律师。作为一个公正无私的法官和穷人的庇护者, 莫尔受到了公众的敬爱。伊拉斯谟在谈到莫尔在法律界出色的工作和廉洁奉公、为人正直的品格时这样说道: 他“毫不吝啬, 也不贪财”, 无论什么时候“也不拒绝任何人的友好诚挚的建议, 关心他人的利益比关心自己为重”, 而且, 这些美好的品格一直保持到他当了法官的时候, 均丝毫未变, 在那时, “无论谁也没有像莫尔那样审理过这么多的案件,

无论谁也没有比他更为光明磊落地处理这些案件，”在大多数情况下，他宁可自己蒙受损失，而“降低诉讼人因立案照例应支付的费用……莫尔的这些品德使他赢得了同胞们的最大爱戴”。^①1504年，26岁的莫尔当选为英国议会下院议员，1509年，亨利八世继位后，莫尔历任国家要职，1523年，当选下院议长。1529年被国王任命为大法官。莫尔在亨利八世刚继位之初，曾对这位新国王寄予厚望，他也曾和许多英国朋友们为新国王的继位而激动、兴奋过，欢呼雀跃过，然而，后来的情形却使他们大失所望。莫尔由于对亨利八世的宗教政策提出异议，拒绝承认国王在教会的领袖地位，此外，作为大法官，他对国王的离婚案亦提出了异议，故于1532年不得不辞去大法官职务。1534年，他被诬陷入狱，1535年7月6日以“叛国罪”被处以极刑，莫尔因此成了亨利八世心胸偏狭与暴政的牺牲品。就莫尔的死而言，他是不幸的，但就莫尔一生的思想贡献而言，他又是伟大的、不朽的。就在莫尔死后400年，1935年，他重新被世人追谥为圣徒。他的英名又被列入前苏联莫斯科红场石碑上的革命英雄名单。英国天主教辩护士G·K·切斯特顿认为，莫尔堪称英国历史上的伟人。在今天英国的威斯敏斯特大厦和伦敦塔均有他的纪念碑。

莫尔只活了57岁。在他57年的生涯中，他无疑为人类的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的那部未来得及完成的《国王理查三世的历史》(约1513—1518)一书，是人们公认的英国编史工作的第一部杰作。1516年，莫尔的代表作《乌托邦》出版，在这部惊世之作中，作者对当时欧洲各国尤其是对英国的普遍经济状况和社会环境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对当时这些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和控诉，并提出了私有制是一切社会罪恶的根源的观点，指出英国“圈地运动”的后果是出现了一个“羊吃人”的社会。莫尔描绘了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欺诈、没有私有财产和贫富差异的理想社会，并提出了一系列诸

^① 参见《伊拉斯谟书信集》(Opus Epistolarum Des. Roterodami)，H·M·艾伦编辑，第五集，第1章，牛津1958年版。

如人人劳动、按需分配、助人为乐、人人平等的理想和原则。莫尔的这些空想社会主义的原则和理想为后来科学社会主义的产生和形成提供了基础和条件。下面，我们就莫尔《乌托邦》一书的基本内容和特征对莫尔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作一简要的叙述。

《乌托邦^①》一书初版于1516年的比利时卢万城，用拉丁文撰写而成。据说，在经过了四个半世纪之多的今天，该书的初版珍本举世共知的仅有五部，其中的一部为前苏联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学院所珍藏。

莫尔的《乌托邦》以对话的形式，反映了早期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残酷剥削和压榨的强烈抗议，同时描绘了作者的理想社会，对以后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我们有时提到的所谓“乌托邦的社会主义”，其名称的来源即在于此。在莫尔的理想社会中，私有制被废除，劳动产品全归社会所有，公民在政治上一律平等，人人参加劳动。但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这个理想的社会是以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为基础的，而且还有奴隶的存在。在教育上，他主张儿童都应受初等教育，教学都应用本族语进行，并提出劳动教育的主张。在哲学上，莫尔崇尚伊壁鸠鲁的思想，相信人的认识来源于经验，但他往往以唯理论的观点反对经院哲学和宗教迷信，而不完全否定宗教，故在乌托邦中仍有宗教存在。

莫尔的乌托邦思想不是凭空捏造的，它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到了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我们知道，早在莫尔之前很久，尖锐的社会矛盾就已存在，尤其是社会的贫富悬殊和人与人之间的阶级差别以及由之造成的不平等现象，使人类之间的敌对斗争尖锐化、复杂化。因此，通过一种什么样的途径、方式或手段来摆脱这种社会矛盾，消除人类之间的敌对状态和残酷斗争，一直是有

^①“乌托邦”一词由希腊文的“否”和“地方”这两个词义所构成，意即“虚无之乡”。后来这个词成了通用词。莫尔《乌托邦》一书的书名最初是Nusqama(由拉丁文nusquam，意即“无处”一词而来)。“乌托邦”这个标题最初出现在1516年11月12日给伊拉斯谟的信中。

识之士和进步思想家们所关注和思考的焦点。正如列宁曾经指出过的那样：“许多世纪以来，甚至几千年来，人类早已幻想过‘立即’消灭所有一切剥削。”^① 因此，在英国早期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莫尔亲眼所见的是农民大批地失去土地和家园，劳动者由于被残酷地剥夺而变得极度贫困这样一种社会现状。面对着这种社会现状，他开始对“消灭所有一切剥削，建立人人幸福平等”问题的思考就不足为奇了。《乌托邦》一书的写作动因，首先来自于当时英国由于资本主义关系而导致的激烈的社会冲突。写作的原料或素材当然也来自于组成当时社会现实的各个方面，其中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和宗教、道德、法律等等；其次，由于受古代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理想国》思想的影响，莫尔早在青年时代就已十分推崇柏拉图的《理想国》，并且常常是废寝忘食地研读它，爱不释手。伊拉斯谟在致乌尔里赫·冯·胡滕的一封信中曾这样说道：莫尔酷爱“柏拉图关于公有制的学说”，并千方百计地捍卫了它。^② 莫尔早期的传记作家斯塔普莱顿也在其著中论证了柏拉图思想对莫尔思想的影响，他说：莫尔“最喜欢阅读和研究柏拉图以及柏拉图派哲学家的著作，因为，从他们的著作中能够了解到关于国家管理、公民的社会生活以及他们相互关系的许多事情”。^③ 我们可以在《乌托邦》中找到柏拉图的《理想国》对莫尔思想影响的痕迹。^④

莫尔《乌托邦》一书中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展开，主要是从对当时英国社会—经济发展现状的批判入手的。首先，莫尔对英国“羊吃人”的圈地运动作了全面的调查、分析和批判。《乌托邦》中所提供的有关文献资料反映了16世纪的英国在经营农业的方式方面所发生的历史性变化：原先那些对耕种其世袭领地

① 列宁：《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列宁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31页。

②③④ 参见奥西诺夫斯基：《托马斯·莫尔传》，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05页。

的农民进行剥削的封建领主已不再满足于获得传统的地租。随着市场情况的变化，许多英国封建主开始抛弃原有那种需要劳动力较多而收入较少的土地经营方式，转而经营大规模的牧羊业。正是由于牧羊业的迅速发展，导致了大规模的圈地运动和对农民的掠夺，流离失所、漂泊无定的农民成了大地主暴力的牺牲品，整个社会顿时显得更加混乱、黑暗和残酷。莫尔在书中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描绘了把耕地变为大牧场给人民带来的悲惨后果以及大地主圈地者的残暴和不人道，他说：这些贪得无厌的剥夺者们“把可以居住可以耕种的每个角落都弄成荒地，仿佛他们的鸟囿和兽园占地还不够大”。^①莫尔爱憎分明，他对那些被无辜剥夺家园而实际是“全部财富的创造者”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们深表同情，而对那些圈地者怀着深刻的憎恨，把他们斥之为“寄生虫”，一种“馋嘴而且是贪婪的国蠹”，^②他们“破坏地界，用一条篱栅圈起几千亩土地。佃农们从土地上被逐出，他们的财产被用诡计或压制的方式剥夺掉。他们受尽折磨，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家业”。^③由于人们为了生计而不得被迫出卖自己一切值钱的家业，一旦他们在流浪中钱花尽后，在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的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又不得被迫走上诸如抢劫、盗窃为生的犯罪之路，有的甚至因此而受到绞刑等的惩处。总之，圈地运动使千千万万的男人和女人、丈夫和妻子、孤儿和寡母走上了悲惨绝望的境地。

当然，圈地运动也并不是造成当时英国普遍灾难性贫困的唯一原因。在《乌托邦》的第一部，莫尔通过杰出人物拉斐尔·希斯拉德之口指出了造成这种普遍灾难性贫困的另外两个原因：一是战争；二是统治者腐败的寄生性生活。

^① 转引自奥西诺夫斯基：《托马斯·莫尔传》，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13页。

^{②③} 转引自奥西诺夫斯基：《托马斯·莫尔传》，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14页。

亨利七世和亨利八世统治期间，频繁的、旷日持久的连年战争不但耗尽国力，而且民不聊生。战争造成了千百万少胳膊缺腿的病残者，这些曾经为响应国家和国王号召而浴血疆场的人们，病残的躯体使他们再也不能从事正常的劳作，健康因素和年龄状况都不可能使他们有重新获得学习、掌握新技术、谋求新职业的机会和条件，等待着他们的无疑是贫困、饥饿、衰老和死亡。这些人既是社会和时代的牺牲品，同时又成了社会的包袱和不安定因素。

此外，统治者们的腐败和不劳而获的寄生性生活，更是造成社会不平等现象的主要因素。他们对广大老百姓进行敲骨吸髓的重重盘剥，他们的生活穷奢极欲、挥霍无度。极大的社会反差致使一些人过着花天酒地、醉生梦死的生活，另一些人走投无路，铤而走险，沦为流浪汉、乞丐、小偷或强盗(其中自然也有因不平而豁出性命为之的举刀杀人犯)。《乌托邦》第一部十分深刻地揭示出了导致英国社会普遍灾难性贫困的三大原因，的确是切中了社会之时弊的。当时英国社会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那么，如何能消除或摆脱这种不平等呢？这更是莫尔《乌托邦》一书所关注的主题。

《乌托邦》不但对产生(包括普遍性贫困在内的)社会灾难的原因进行了深刻的揭示和分析，同时还指出了种种恶习(如不平等、剥削、农民和手工业者等劳动大众的赤贫以及对下层劳苦大众血腥立法等现象)得以产生的基本根源就在于私有制。针对这种私有制统治，莫尔指出：“凡是有私有制，凡是人们用金钱衡量一切的地方就会有这种统治，那么，对国家的管理未必有一天能够是公正和成功的，”^①如果有谁面对着这样的统治而承认这样的社会是公正的，那就无异于承认“最坏的人获得一切美好的东西是正确的”，^②或者说承认一切财富由极少数人瓜分，其

^{①②} 参见奥西诺夫斯基：《托马斯·莫尔传》，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19页。

他人同时一贫如洗、饥寒交迫是可取的。^① 莫尔看到了私有制统治的恶果必然是创造财富的劳动者不能拥有财富，劳动者创造出来的财富必然被私有制的统治者（即“社会上最坏的那部分人”）所攫取。因此，莫尔认为，只有消灭私有制，财富的分配才能公平合理，人们也才有可能过安宁无忧的日子。相反，如果私有制存在，那么，人类的绝大多数人将永遭贫穷和苦难。照这样下去，复兴社会并使它日益完善美好也将是没有任何指望的。这就是莫尔要消灭私有制的基本理由。

莫尔在《乌托邦》的第二部中，着重对他那个消灭了私有制和不平等的理想社会进行了详细、具体、生动的描绘。首先，他想到的是如何治理国家，从而使之有利于公众的社会福利事业。莫尔乌托邦理想社会的基本制度是实行财产公有。国家为了全社会的利益，一些生活必需品由元老院来负责统计和支配。这个社会之所以物质丰富，其原因就是：一、没有个人财产私有制；二、人人都必须参加生产劳动，社会上没有游手好闲之徒，每一个人除了从事农业劳动外，还必须要学会一门或多门手艺。这样，劳动，就不会再出现过寄生性生活的人了。参加创造财富的人多了，社会的物质就自然会极大地丰富，在这个基础上，按需分配的原则就可以实现。

由于实行了人人劳动和按需分配的原则，因此，货币的功能也就随之丧失。金钱用不着了，人们也就不贪金钱了。莫尔说：在乌托邦取消货币的使用，“这就砍掉了多少烦恼啊！这就铲除了多少罪恶啊！谁不知道，金钱既然取消，欺骗、盗窃、抢劫、吵架、骚乱、喧闹、叛乱、暗杀、变节、放毒等虽然每天受到惩罚却只能施以打击而不能制止的罪行，就不发生了？谁又不知道，恐惧、焦虑、烦恼、辛苦的操作、不眠的通宵也会随着金钱的消失而消失？而且，贫穷的手仅仅由缺乏金钱造成，一旦金钱到处废

^① 参见奥西诺夫斯基：《托马斯·莫尔传》，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19页。

除，贫穷也就马上减少以至消失了。”^① 金钱是财产或财富的象征，对金钱的占有就是对财产或财富的拥有。金钱是万恶之源，多少人的苦难和多少人的犯罪以及社会的不安定都与金钱有关。因此，乌托邦社会经济制度的基本特征就是取消金钱制。金钱制的取消从制度上铲除了私有制的基础，从而从根本上割除了一大社会毒瘤。

在《乌托邦》中，莫尔除对未来理想社会的经济制度作了描绘外，他还对未来新国家的社会政治制度作了具体的构想。

乌托邦是一个由诸多城市组成的联邦。这些联邦直接管辖下的城市，其法律和设施均是相同的，首都设在西马乌鲁提城，元老院是国家的主要政治机构，其成员均由各个城市每年选派出来的人员所组成，任期一年。除了元老院外，还有一个民众大会，此乃与元老院并存的国家政治机构。国家政治管理机构的管理方式完全是公开性的，换言之，它是在全民的监督下进行的，因此，带有极高的透明度。其中还规定：共和国的高级行政官员必须从博学多才的学者中挑选。只有由深明事理的哲学家和学者来领导，才能“把粗野、不文明的人民引到那种迄今还优越于几乎所有凡人的生活方式和文明”。^② 在乌托邦中，不但国家的官吏富有学识，清正廉明，而且，他们与民众也始终保持一种密切的友好关系。在那里，官员们工作不怠惰，态度不傲慢，丝毫不会有令人望而生畏之感，百姓们因此也乐意把他们视为“父母”，由衷地尊敬他们，爱戴他们。国家官员与人民大众的这种鱼水相依、水乳交融的关系和废除了私有制与特权阶层的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以及民主政治制度的切实实行，使我们当代人似乎真正从中感悟或想象到：在那样一种理想社会中，一个个挺立着的都是不受任何压迫、剥削、欺诈的自由人民和昂首挺胸、掌握了自己命运的真正的主人。

① 托马斯·莫尔：《乌托邦》，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17页。

② 《莫尔全集》，第4卷，第122页。

乌托邦人酷爱自由，反对暴政，热爱民主，憎恨专制。他们也希望邻国的人民像他们一样过上幸福安宁的生活。因此，他们也常常应邀派出一些人员去邻国当官员，按照乌托邦的管理模式进行管理。由此可见，乌托邦社会的人们已经具有了那种不仅要使本国人民获得幸福和解放，而且还要让他人或他国人民获得幸福和解放的宽阔胸怀和远大理想。

乌托邦不但是一个官民平等、互尊互爱、亲密无间、共享幸福的民主国家，同时也是一个高度重视法制的国家。乌托邦人深深懂得法制能保护人民大众的利益。法律能使他们幸福安宁地生活，法律能给他们带来人与人之间的种种平等。因此，自觉地学法、守法、用法成了公民的自觉意识和行为。乌托邦的法律并不繁杂，一切法律条文的制订都以普通老百姓能看懂为前提。在那里，没有所谓“含混不清”的法律条文，所以，一般的老百姓理解和掌握并不难。在乌托邦人看来，任何公正的法律，都是简单而又明了的。越简单越明了的法律就越为全国人民所学习和掌握，而一个人人懂得法制和人人掌握法律的社会就必定是安宁幸福的社会。由于乌托邦人人都懂法、守法，因此，在那里，律师职业就成为多余的了。

在对外政治和战争问题上，乌托邦人主张国与国之间应该和睦共处，相安无事，不应该发生冲突和战争。乌托邦人崇尚和平，厌恶战争。他们认为，战争是一种极野蛮的行为，没有比通过战争赢得的荣誉更不光彩的了。不过，乌托邦人反对战争，但他们又不怕战争。如果一旦有战争，他们也同样可以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接受战争的挑战，因此，莫尔说：“他们的男女在固定的日子里刻苦地参加军训，锻炼自己，唯恐一旦有需要而他们不能作战。但是他们决不轻易地投入战争。他们出战仅仅是为了保护本国领土，或驱除侵入友邦的敌人，或出于怜悯某个受专制压迫的民族而用武力把他们从暴君的桎梏奴役下解放出来，这是人类的同情心所激起的一种行动。”^① 由此可见，乌托邦人在对外政策和战争

^① 托马斯·莫尔：《乌托邦》，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94页。

问题上的看法是：主张国与国之间的和睦友好和平等，但如果有战争，他们一是反对，二是不怕。一旦打起仗来，也决不手软。乌托邦人决不首先发动战争，但他们也随时准备给外来入侵者或侵略友邦的敌人以迎头痛击。不过，他们在介入战争时，尽量不让战争在本国进行，即使是在他国进行，也尽量做到不伤害广大人民，决不滥杀平民和无辜。乌托邦人的这种不要战争，不怕战争，为正义而战和为国家、为人类的和平幸福而战、战而胜之的英勇无畏精神，仍是我们今天的人们所应学习的。

莫尔在《乌托邦》中还论及了宗教问题。乌托邦人有其自己的意识形态。莫尔认为，国家应该实行宗教宽容，允许每个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在乌托邦岛的每个城市，都有各种各样的宗教。一些信奉者都各有自己的崇拜之神，如有人崇拜日神，有人崇拜月神，有的崇拜星辰，有的则将以往历史上某个为人所尊崇或爱戴的圣贤奉为神明。不过，在乌托邦岛上持上述信仰的只是一小部分，而对于绝大多数人或者说对于那些较有见识的人来说，他们不信上述这些神灵，“而只信某个单一的神，这个神是不为人知的，永恒的，巨大无边的，奥妙无穷的，远远超出人类悟解的，就其威力说而不是就其形体说是充塞宇宙间的。他们称他为父，把万物的起源、生长、发育、演化、老死都归之于他。只有对他，乌托邦人才加以神的尊称……并且其他所有的乌托邦人尽管信仰不一，却在这点上意见一致，即只有一个至高的神，是全世界的创造者和真主宰，在本国语言中一致称为‘密特拉^①’”。^②无论是一神信仰还是多神信仰，在乌托邦社会中都是不受干涉的。乌托邦人崇尚信仰自由，故即使是对于其教义不为乌托邦人所赞成的基督教来说，他们也还是持“既不阻止别人信从，也不侵犯已经信从的人”的态度，^③乌托邦人历来就有一条最古的制度，那就是：“任何人不能由于自己的信仰而受到责罚。”，^④这也许

① 密特拉 (Mythras) 即古代波斯的太阳神。

② 托马斯·莫尔：《乌托邦》，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03页。

③④ 托马斯·莫尔：《乌托邦》，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05页。

就是乌托邦人具有高度宗教信仰自由的重要历史原因吧。莫尔的乌托邦的宗教宽容精神与乌托邦的国家政治管理手段是有密切联系的。它是与理性主义精神有关的。在乌托邦国家，只要每个人的宗教信仰是积极的，就允许他持有这种信仰。乌托邦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可以不受阻碍地自由信奉适合其特性的宗教。不要小看宗教信仰自由，这里与国家的统治管理水平有着极大的关系。甚至可以说，宗教信仰自由有利于国家的统治。美国的乔·奥·赫茨勒在谈到乌托邦的宗教信仰与社会秩序的关系时这样写道：“乌托邦的每一个人都可以不受阻碍地信仰适合其特性的宗教。理性这个仁政的唯一试金石证明没有别的规定比这更合理了。哪里不强迫人民信仰某种宗教或压制宗教，哪里就不用害怕派别斗争和由此而引起的反社会后果。”^① 宗教宽容使乌托邦公民们按照自己的意志和特性自由地信奉他们心中的尊神。人们在精神上有了理想的寄托，就自然会胸襟开阔，心平气和，社会上就再也不会会有不平之人起来反抗或作乱。这样的社会，一定是安宁和祥和的。这样的国家管理是理性的和成功的。乌托邦之所以要主张信仰自由和宗教宽容，其实也是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和人民的幸福安康，因此，它既是国家理性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国家仁政的体现。

关于莫尔《乌托邦》一书中的主要思想，限于篇幅，我们大致就论述到这里。上文讲到，莫尔的乌托邦思想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启示于柏拉图的《理想国》，然而，尽管如此，他在许多方面仍与柏拉图不同，甚至可以说是在《理想国》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否定、修正、演进和发展。例如，柏拉图的《理想国》要求他的统治阶级那部分人的财产和妻室归公，以此作为限制或摒弃个人主义本性、让这些统治者能专心致力于国家治理和公众福利事业的一种积极举措。莫尔与柏拉图不同的是，他不但要废除财产私有制，而且主张必须废除阶级的差别。只有废除了阶级差别，

^① 乔·奥·赫茨勒：《乌托邦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40页。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才有实现的可能。此外，莫尔还在其他诸方面提出了与柏拉图不同的思考。记得著名德国哲学史家文德尔班曾将莫尔的《乌托邦》与柏拉图的《理想国》作了精细的对照和比较，并作了如是评述：“莫尔以现实为对比所描绘的、在乌托邦岛上的完美的社会状况的理想蓝图，其主要轮廓是模拟柏拉图的理想国。然而，这种人本主义的复活带有近代社会主义的色彩，它与原型不同之处在于废除了阶级差异：[据那位古代思想家看来，在他思考现实存在的个人的智力和道德地位的差异之后，他认为阶级似乎是必然的了。]它所效法的与其说是柏拉图的《理想国》，倒不如说是柏拉图的‘规律’。莫尔从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出发，为了尔后的发展，进行了典范的抽象工作；莫尔认为一切公民有权参加社团，而柏拉图的理想国则认为这些社团是对统治阶级的要求，把参加社团当作扬弃个人利益的本能的方法。在柏拉图那里，特权阶级应扬弃一切私有财产以便全心全意奉献于全民福利；而在莫尔那里，则要求把废除私有财产当作消除罪恶的最可靠的方法。废除私有财产是基于对公有财产人人有份的平等权利。但是与此同时，这位近代的乌托邦主义者还坚持那位古代哲学家的理想模型，坚持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于认为对物质利益的绝对平分是所有公民同等享受社会、科学、艺术、精神财富的不可缺少的基础。的确不错，这位英国大臣比起那位雅典革新家来，在这方面，思想民主得多，并给予个人更大的私人生活的自由：莫尔决不会让全体公民限制在共同的信条和信念上。国家的公共设施就其有效的正常秩序而言基本上是针对外部生活事务的。他认为，要满足社会的物质需要，对于全社会成员，六小时的正常工作日就足够了，剩下的时间每一个人可以自由支配，去做更高尚的工作。在莫尔那里，根据这些规定，产生了出自柏拉图的蓝图、更高级形式的近代社会主义的纲领。”^①文德尔班的以上述评揭示了《理想国》与《乌托邦》的源流关系，又阐

^① 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下卷，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588页。

明了这二者之间的思想之异同，既承认了柏拉图《理想国》的历史地位，又肯定了莫尔《乌托邦》源于《理想国》又高于《理想国》的历史进步意义。

莫尔，作为一名空想社会主义者，比柏拉图这位古代哲人要高明得多。莫尔不愧是一位高瞻远瞩的思想家，他始终站在时代的高度，以其深邃的洞察力，预见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美好远景和精神走向。早在16世纪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作为一个资产阶级学者，莫尔以一种超前的意识预示着人类未来发展的曙光，从而给迷茫的人类以理性的启示。莫尔的乌托邦思想对人类的发展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莫尔不仅是一个人道主义者，而且，他更是一位卓越的思想家。他写《乌托邦》，并不是像一般作家那样凭空臆想或从其他作品中寻求资料。相反，他从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英国现实社会中发现问题的根源，寻找答案。作者在书中充满着对当时社会中的黑暗面（诸如对农民的残酷剥削，统治者的贪婪、荒淫和寄生性等）的无情揭露和批判，同时对下层劳动人民（尤其是农民）寄予深切的同情。这些都说明作为资产阶级学者的莫尔已经摆脱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局限。西方有的学者^①，他们试图通过对《乌托邦》的诠释，把他与古希腊罗马和中世纪的思想混为一谈，以此阉割莫尔思想最本质的东西——共产主义理想。莫尔在对封建专制国家的政治制度进行无情批判的同时，早已看透了私有制是这种以剥削为特征的专制国家赖以存在的基础，并首次提出要消灭私有制，用一种没有私有制和没有人剥削人的制度来取代资产阶级制度。然而，由于历史的局限，莫尔这种空想共产主义者在提出这个理论之后，却无力去解决它。这正如恩格斯所说的，这种“不成熟的理论，是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②莫尔的最大历史功绩就在于他深刻地批判了当时业已产生的资产阶级制度，这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当农

① 如别克尔、霍勒利斯、布里奇等。

②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 298页。